



残酷的战争没有击毁中国的教育事业，更没有令中华民族消亡。**历经战火洗礼的师生们，在危难中奋进，重塑民族精神。**

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一批大学，为抗战及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宝贵人才。1936年，在民族存亡危急关口，中共作出了大规模培养干部的战略决策，在前身中央红军学校基础上，于陕北瓦窑堡创办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，简称“抗大”。

“抗大”成立之后，中共在抗日根据地还先后成立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学院、中国女子大学、自然科学学院、中国医科大学、延安大学、江淮大学等20余所学校，为中共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在汤涛看来，14年抗战中，社会各界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付出，源自于一种朴素的共识。“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，全国各民族在教育领域有共识，认为教育是保留中华文明的基础。知识分子普遍怀有强烈的教育救国的情怀。”

1940年，交通大学在重庆成立分校。1942年上海租界沦陷后，重庆分校随即升为大学本部，由小龙坎迁九龙坡。为满足抗战时期军事技术、工业经济等需求，交大新设航空系、造船系和电信研究所，服务抗战所需的航空、舰船、电信等军事技术。

大夏大学1941年在香港办分校时，受交通部委托开设电讯专修班，招收40余名学员训练电务技术，支援内地抗战急需；1943年，大夏大学受财政部盐务署所托，开办盐务专修科班，为国家培养盐务人才。

此外，内迁的高校，不仅保存文脉，培养急需人才，也为其战时所在地带去了积极影响，对当地的教育、经济与文化都作出了显著贡献。

汤涛告诉记者，1937年底，大夏大学内迁贵阳，成

为贵州第一所本科院校。在黔办学期间，学校师生开展的有关贵州的民族研究，使这一领域得到一批开创性的学术成果。

光华大学成都分部，针对性培养了西南地区所需人才。校董张仲铭捐赠60亩良田作校基，校园后扩大至100余亩，十年间培养学生2352人，川籍学生占80%以上，有力促进了西南教育和经济发展。

1937年，同济大学校园毁于日军炮火，学校历经三年迁徙，最终于四川南溪李庄安下校舍。在李庄，同济医学院杜公振、邓瑞麟等人通过实验，研究发现了当地民众长期食用土法熬制的食盐中氯化钡超标的问题，提出诊疗方案，治愈了当时困扰川南广大地区百姓的“麻脚瘟”。

夹缝求存，“孤岛”继续办学

1937年8月25日，《申报》上刊登了一则迁址开

抗战初期被炸毁的务本女中黄家阙路主教学楼。

